

20世紀上半葉的邊疆民族考察與 “ 邊疆民族 ” 概念 : 以歷史語言研究所學者為例

著者	王 明珂
journal or publication title	The Reformulation of Concepts and Intellectual Systems in Modern East Asia
volume	35
page range	279-291
year	2010-03-25
その他のタイトル	20世紀前半における中国辺境民族考察と“ 邊疆民族 ” 概念について 歴史語言研究所の学者を例として 20 seiki zenhan ni okeru chugoku henkyo minzoku kosatsu to "Henkyo minzoku" gainen ni tsuite: Rekishi gogen kenkyujo no gakusha o rei to shite
URL	http://doi.org/10.15055/00002498

20世紀前半における中国边境民族考察と“边疆民族”概念について——
歴史語言研究所の学者を例として

20世紀上半葉的邊疆民族考察與“邊疆民族”概念：

以歷史語言研究所學者為例

王 明珂（歷史語言研究 中央研究院 台北）

前言

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於1928年。往後十餘年中，它網羅及培育出許多當時中國頂尖的知識菁英。歷史學界的傅斯年、顧頡剛、陳寅恪、陳垣、徐中舒，考古學的李濟、梁思永、夏鼐、石璋如，甲骨學研究的董作賓、胡厚宣，語言學界的趙元任、羅常培，體質學方面的吳定良、陶雲逵，民族學的凌純聲、楊承志、芮逸夫、馬學良等等，這些經常被譽為中國近代學術史上各學科領域開創者之學者們皆出於歷史語言研究所。如此集四方學術菁英於一堂，並得到國民政府極力支持的研究機構，產生在一個變遷亦有傳承的大時代情境之中。

這個時代情境，便是“中國”由傳統中原王朝轉變為當代中國的情境。清代中期以後，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挾其船堅砲利在全球爭奪資源。科技武器只是其侵奪工具，西方帝國主義的擴張性政治軍事活動背後更有一套知識理論基礎——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與民族國家（nation state）概念。社會達爾文主義將生物界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運用到人類社會的演化之中。如此，當時科技文明進步的歐美諸國代表人類演化上較成功的群體，而亞、非等地文明停滯的古國與落後部族，則被當作是物競天擇下應被淘汰或有待被開化的失敗者。民族國家概念將“種族”與“國家”等而為一，於是民族國家成為物競天擇下彼此相競的“生物體”。便是如此，在社會達爾文主義與民族國家概念二者婚配下，產生的便是19世紀至20世紀上半葉的殖民帝國主義列強。

19至20世紀上半葉的民族學（ethnology）是西方帝國主義與民族國家（nation state）之產物。它以“民族”來支持民族國家作為全球資源競爭的主體，並以“文化”之複雜、進步與原始落後，來區分征服教化者與被征服教化者。如此，它所產生的學術知識，也支持歐美民族國家的全球性資源利益爭奪。清末民初，在列強爭奪與瓜分中國及其周邊地區資源的情況下，接受“民族”概念的中國知識分子也開始建立自身的民族國家。經過一番爭議後，此國家之構成基礎“中國民族”包括漢族，以及帝國

治內的非漢族群與周邊藩屬邦國人群——這是長期歷史發展所形成的中原帝國架構，在近代民族主義國家全球資源競爭刺激下產生的變體。

1911年的革命及隨後幾年，中華民國此一民族國家已完成其政治架構，但此國家的構成主體——中華民族——其“民族”性質尚不明確。在當時民族學概念中，“民族”是一群有共同語言、體質、文化的人群，但顯然中華民族之中包括了許多語言、體質、文化有異的“民族”，特別是在舊帝國時期被視為蠻夷之域的邊疆。因此，建立一個知識體系，一方面說明中華民族中究竟有多少“民族”，另一方面透過文化與歷史來闡述他們如何構成一整體的中華民族，是當時中國人文社會學界刻不容緩的任務。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或簡稱史語所），便在如此的時代氛圍下成立。史語所成立後內部學術分組幾經調整，但不外乎歷史、考古、語言、體質、民族文化與民俗等大項，此也反映這樣的時代背景——由語言、體質、文化等方面來識別、區分國族內各個民族，由考古與歷史研究中探索其歷史源流。20世紀上半葉史語所學者們之名作，如傅斯年之《夷夏東西說》，芮逸夫的《中國民族之構成》，李濟所著《中國文明的開始》¹，皆為當時史學、民族學、考古學等學術研究與國族主義結合之產物；這些知識之普及，也貢獻於中國國族概念之具體化。

在這篇文章中，我將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民族學（或人類學）者之西南民族考察作為一個縮影，來說明近代中國國族建構中的“邊疆”建構過程——國族邊疆如何由舊帝國時期的蠻夷之域成為少數民族地區。

黎光明的川康民俗考察，1928-1929

黎光明（1901-1946），出生於灌縣回民家庭，1946年死於靖化縣長任上。1922年，他曾就讀南京東南大學史學系，因加入國民黨，積極參與“反軍閥、反帝國主義侵略”學潮而被東南大學開除。離開東南大學後，他與一些熱心革命的朋友們至廣州，朋友們大多進了黃埔軍校，惟黎光明因信奉回教，“恐軍旅生活難符教規，而改讀中山大學”。1927年他畢業於中山大學之時，正值歷史語言研究所在中山大學籌辦。1928年7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正式成立，黎便成為該所助理員，並於同年8月底啟行往四川去，進行“民物學調查”²。

他9月底至成都，在成都遷延至1929年1月始邀集朋友嚮往岷江上游去。不久，他們在茂縣北的疊溪受阻於戰事（甘軍之亂），返回成都。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對他滯留成都，以及呼朋引伴前往作調查，相當不悅。在給黎君的信中，傅一再訓斥他“千萬不要在成都一帶交際”、“少群居侈談政治大事”。由此可見推動黎光明前往邊疆作

1 傅斯年，〈夷夏東西說〉，《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5）；芮逸夫，〈中國民族之構成〉，《大陸雜誌》7.1（1953）：25-33。

2 有關黎光明的生平及其此川西考察，請參考，黎光明、王元輝，《川西民俗調查記錄 1929》（台北：歷史語言研究所，2004）。

民俗考察的力量，主要是他與周遭朋友們滿腔的政治熱血。

1929年3月黎光明再度前往岷江上游，此時只有王元輝陪同。他們在汶川、茂縣、松潘一帶遊歷，訪問當地人士及寺院，於1929年6月結束此考察行程返回成都。在這一段時間，他們究竟從事了那些“學術”活動，這些活動的意義如何？關於此，我們可從黎考察歸來後遞交史語所的一篇報告——川康民俗調查報告——來究其端倪。原報告為手稿本，封面署有“黎光明、王元輝報告”，年代為1929。報告分三冊裝訂。標題為“西番”之冊，上面也註記此為“川康民俗調查報告之一”。標題為“關於西番的裸記”者為該報告之二。“獐獐子、汶川的土民、汶川的羌民”一冊，封面原為“川康民俗調查報告之四”，但在四字旁，有小字加註稱“如語言稿不合印則改為三”。可見本資料原有語言稿一冊，但此資料似已遺失。

這篇報告的內容，較像是一篇遊記。作者們記述他們在汶川、松潘等地的遊歷，與當地土司、喇嘛們的互動與對話。報告中只有西番一章較具“民族誌”之形式；他們分節描述“西番”的體質、服飾、飲食、居住、一日一年一人的生活，以及土官、宗教、社會概況等等。顯然這因為他們在松潘停留的時間較長，而得有較豐富的資料。在其他各篇對羌民、土民及獐獐子之描述中，他們的書寫便十分的隨興。無論如何，作者們毫不隱藏其對“邊疆之人”的主觀印象、偏見，表現在文中幽默的嘲弄與譏諷書寫之中——特別是對土官及喇嘛。如他們對松潘附近的大寨土官但真王吉，有以下一段引述他說的話：

末了，他開誠布公的向我們談一段關於政治問題的話。

「大清皇帝出來不出來還不曉得呵！」

「大清皇帝真好。他每年要給我二十四兩餉銀；三年去朝貢一次，他還賞我們很多的東西。民國不給我們的餉，我們也不去朝貢了。」

「此刻，聽說，沒有皇帝，官也要拿來選。你選這個，我又去選那個；選來選去，兩邊打起架來；時而那個趕走了這個，時而這個又趕走那個；這個說那個的不對，那個又說他自己好。成都的三大憲也就換過不少了！到松潘來的大官小官，一下說是這個放來的，一下又說是那個放來的；有些同是一個人放來的也會打起架來。我們弄不清楚這些那些，也不曉得怎樣才好！」

「還是大清皇帝出來要好些。」

這不只是對“西番”土官的嘲弄，也是藉著這些邊疆頭人之口來諷刺當時四川在軍閥割據下的軍政亂局。

在汶川，他們對瓦寺土司的一個弟弟，一位土舍，所說的家族史也表現出不以為然的嘲弄。這位土舍說，一個河南移民帶了四個兒子來川，當今瓦寺土司便是這其中一個兒子的後代；另外，他在言談間也表現對“土民”風俗的鄙視。黎光明等人在報告中則對此土舍大加譏諷：

故這個姓桑的漢人會作了這土民的土司，說是「由“偷龍轉鳳”而得」。這位土舍對我們說到“偷龍轉鳳”這一層，曾加上“不要笑”三個字。這個傳說的意義是在證明“索家此刻並非土民之後，乃天漢之裔也”。

索習之，聽說，在四川的軍隊裡跑過很久，而且還做過小小的軍官，所以他也全無“土氣”。他的談話中每每有“他們土民”、“我們索家”的話頭，其意思是不承認索家是土民的同種。他睡在鴉片煙燈的旁邊，替我們談“他們土民的老規矩”³。

文內引號為原作者所加，顯然是為了提醒讀者注意索習之不尋常的說詞。由黎光明等人的觀察描述中我們可得知，這位土舍之舉止言談都有如一位漢人鄉紳，而且他相當鄙夷其子民的非漢民族身分與文化。這樣的現象——土著上層頭人與其子民不是一個“民族”——在黎光明等人的當代民族知識中是頗為怪異的，因此黎等人在當時以及在後來的描述（上引文詞）中，都對這位土舍之說表現不以為然的嘲弄。

相反的是，當時的瓦寺土司索季皋對邊疆事務之認識，讓黎光明等人印象深刻。他們記載道：

土司口齒清楚，語言流利，所談輒引報章雜誌。他說，「英國人想拿政治力量來征西藏，那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情；因為西藏人對於宗教的信仰太深，而其所信之教又與英國人所信的不同。日本雖然和西藏的地方隔得很遠，但是，西藏裡常有日本人的腳跡。日本人對於西藏全沒有政治關係，但他們是信佛教的，所以容易和西藏人說得融洽。他們要想拿宗教去和西藏生關係，這確是深堪注意的一件事情」⁴。

索季皋當時身兼汶川縣團練局長，又是金川江防軍總司令部下的一個區司令官（僅次於總司令）。這些職銜及其談吐，都顯示此土司在時代變遷中已與時俱進。他似乎有意藉此向黎光明等人炫耀其得自於“報章雜誌”的當代知識，而黎等人對此的確印象深刻因而將它們記錄下來。

黎光明等對土官、土舍等“邊疆之人”之譏諷，更見於他對喇嘛的“無知”之描述中。如以下他們對幾位喇嘛的記載：

楊喇嘛既知道孫中山，並且聽說過有蔣介石，但不知有南京也。更可惜的是他問我們道：“三民主義和中華民國到底誰個的本事大”？

凝戈也不懂漢話，他用西番話問我們，「宣統皇上這一會還好嗎？」這般態度，彷彿不是他和宣統皇上有舊，便是他知道我們一定和宣統皇上相熟。他從不曾知道有大總統袁世凱，當然更不知道有主席蔣介石。同他談到南京，他問，「那是洋人地方不是？」

有一次，我們在大寨土官的家裡遇著一位林波寺的和尚。他向我們說：「據我們的喇嘛卜數推算起來，中華民國（意實單指元首）應該是個大耳朵的人，不然，他不能管領這樣大的地方，大眾一定不能服他的」⁵。

我們知道1920-30年代時，在某種程度上，土司與喇嘛仍在川西及康藏地區掌握本土知識與相關權力。那時，“歷史語言研究所”可謂是國族知識的探索、建構與宣

3 黎光明、王元輝，《川西民俗調查記錄 1929》，頁 169。

4 黎光明、王元輝，《川西民俗調查記錄 1929》，頁 166。

5 黎光明、王元輝，《川西民俗調查記錄 1929》，頁 106、120、29。

傳者。來自該機構的黎光明等人帶著新的國族知識來到此間，以此新知評斷本地土官、喇嘛的荒謬與無知，或進步。他們當時的行動，與往後的報告書寫，其意義皆在於傳達國族主義中蘊含的“普遍知識”理念——邊疆民眾亦我國族同胞與國民，而凡我國民應有此“普遍知識”。他們對邊民“無知”的描述與嘲弄，隱含了教育應普及於邊民間之喻意⁶。

事實上，當時在國族主義下，關於“邊疆”中國知識分子常感到有兩種“無知”。他們驚訝並自愧於對“邊疆”的無知，因此對“邊疆”之地與人的知識探求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強烈自我使命。其次，在此探求過程中他們也驚訝的發現，“邊疆”之人對國家與國族也相當的無知。前面我已介紹黎光明等人在報告中，及其邊區之旅的言行中，所表述的邊民無知。另外，與黎光明偕行的王元輝在出發前發表了一篇“辭別在成都的朋友們”之公開信，在信中他寫道：

我要去到荒寂的西邊。那西邊的地方少人識字，少人知道科學，更少人談得成革命，我覺得有把握處處出風頭⁷。

王元輝在其歸來後所寫的文章中，也有類似的對“邊疆”之描述。他寫道：有人問我，「松潘離成都有多少遠」，我說：「相隔四千年」。這雖是滑稽之談，確是事實如此⁸。

由此可見，空間上的國族邊緣人群，在其心目中也是文明演化時間表上遠遠落後於漢族的國族同胞。

另一種“無知”——知識界對邊疆的無知——也經常表現在從事邊疆探索的知識分子之著作中。1934年一位青年探險家與民俗考察者，莊學本，進入川康邊境。他在歸來後所寫的《羌戎考察記》一書之弁言中稱：

現在圖上對於四川的西北部，甘肅的西南部，青海的南部，西康的北部，還是一片白地。民族學的研究者，關於這個地帶所得到的報告也是奇缺，我為了這樣大的使命更應該進去探一探⁹。

早年進入岷江上游作語言調查的學者聞宥，在由語言學認識到本地羌族之後，也曾感慨學界“不知版圖之內尚有羌人”¹⁰。這是由於，自章太炎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已建構了一“互數千年”作為國族歷史一部分的羌族史，但對羌族（邊疆之人）的民族知識仍然淺薄。聞宥的驚訝與遺憾，表達當時知識分子對於國人邊疆知識的空白感到十分焦慮，也顯示他認為此時對邊疆的知識探求十分急迫。

6 劉錫藩於1933年出版之《嶺表紀蠻》，有一節記錄他對“蠻人國家觀念”之測驗。他指出，結果令人失望之極——30個“蠻人”男子，對於“我國第一二屆總統是誰”、“中國國民黨是誰創的，什麼叫做三民主義”等問題，絕大多數都答不出來。這資料，表現的是同一現象；在國族主義概念下，當時知識分子認為凡我國民應對國家有一種普遍知識。見劉錫藩，《嶺表紀蠻》（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頁 255-56。

7 王天元（王元輝），《近西遊副記》（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7），頁 2。

8 王天元（王元輝），《近西遊副記》，頁 195。

9 莊學本，《羌戎考察記》（上海：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7），頁 1。

10 聞宥，〈川西羌語的初步分析〉，《華西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集刊》（Studia Serica）2（1941）：60。

來自國族知識核心的知識分子，如黎光明等，對“邊疆”之地與人的知識不明確也表現在他們對本地“民族”的理解上。今日，這些地方的主要民族為藏族、羌族、漢族、回族。然而在這本報告中作者提及的“民族”，除了前述的獐獐子、土民、羌民外，還有“雜谷民族”。黎光明、王元輝對今日川西雜谷腦河流域（約當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理縣）住民有以下描述：

這些人究竟是和汶川的羌民同種嗎還是和土民同種，我們不敢斷定（因為有些人這樣說，有些人那樣說），我們權當他們是一個獨立的民族，暫給他們一個“雜谷民族”的名稱。

雜谷域的村寨居民今日部分成為嘉絨藏族，部分成為羌族。另一個例子是，關於今日小黑水（今黑水知木林一帶）人的民族屬性，黎、王二人也覺得難以斷定。

拿他們的語言習慣研究起來，絕不敢斷定他們和西番、雜谷民族，或羌民是同種。西番等民族也絕不願承認是和他們同種的。一般人都說獐獐子是獐獐的同種，所以被稱為獐獐子。而今獐獐居住的地方是在四川南部雷波、馬邊、西昌一帶的境內，怎麼又會有一部分獐獐子住在這松潘境內來呢？

“西番”指的是阿壩州黑水、松潘、紅原、若爾蓋，以及大小金川等地的住民；今日他們與小黑水人都被識別為藏族。由此亦可見，在1920年代之末，川西與西康仍是國族內其民族區分待釐清的邊疆。

黎光明、王元輝的報告交付予史語所之後，即被束之高閣，在2003之前從未出版。顯然因被認為是缺乏學術價值之故。我們知道，1928年在中國，那是一個有“民族”概念而無“民族學”的時代，黎光明個人也缺乏民族學或語言學的專業知識背景。

凌純聲、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考查，1933

就在黎光明作川康考察的那一年，受西方人類學訓練的凌純聲學成歸國。凌純聲（1902—1981），江蘇武進人，1919年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1924年畢業時該校已改名為東南大學。1926年他赴法國巴黎留學，師事人類學家馬歇爾·牟斯（Marcel Mauss）等人，1929年在法國巴黎索邦第一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凌返國後，任職於剛成立的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1930年他到東北進行赫哲族田野考察；這可稱是第一個中國學者進行的、具當代人類學意義的田野研究。這一年他結束考察南返經過北京，在此認識他的同鄉、同學芮逸夫。芮逸夫是江蘇溧陽人，生於1898年，長於凌四歲。大學時也曾就讀於東南大學，但他在學的時間卻稍晚於凌。1927年，就在他即將完成大學學業前，東南大學因捲內南北政爭、學潮嚴重而陷於停頓，芮被迫離校。不久，芮在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擔任館員，結識了由東北歸來的凌純聲。凌談起自己人類學研究工作，芮大感興趣，有志從事人類學研究。於是在凌純聲的介紹下，芮逸夫進入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擔任助理員，並先在北京隨趙元任先生學習語言學及國際音標記音，以為進行民族調查作準備。

1933年凌純聲與芮逸夫一同赴湘西南鳳凰、乾城、永綏等地，進行歷時三個月的湘西苗族考察。基於當時流行的民族概念，與其習自西方的民族學、人類學、語言學，凌與芮自然千方百計的在此探尋本地非漢的民族文化因素。他們深入鄉村，參與及觀察民間種種婚、喪與宗教活動，記錄苗語詞彙發音。在歷時約三個月的湘西苗族考察中，他們除了得到大量民俗文化資料外，也攝得許多照片以及一段錄影片。

20世紀上半葉的南方與西南“苗人”地區，由於漢化效應，許多當地民眾——特別是地方大姓豪族與知識分子——皆以本地不同於漢的習俗與“說苗話”為落伍、鄙陋，以仿效漢俗及能說漢話為榮。在民族主義求冀求國族“進步”之氛圍下，人們更普遍以守舊為恥。在凌純聲、芮逸夫所撰的《湘西苗族調查報告》中，有如下的一段記載：

近年以來，地方政府屢次出示嚴禁苗中淫祀，因此跳鼓藏一類的鼓舞，已不常舉行。而苗中稍受教育所謂有識之士，談及他們的鼓舞，常引為奇恥大辱，以為是暴露他們野蠻的特徵¹¹。

芮與凌在此發掘有異於漢的本地習俗、語言，如此作為在那些漢化的地方士紳看來與“發人隱私”沒有兩樣。因此曾有湘西鳳凰一帶的地方士紳去函國民政府的蒙藏委員會，控告史語所學者“以苗俗古陋，多方採集，製成影片，以為談笑之資、娛樂之具、謀利之用”¹²。

然而史語所學者仍在此得到許多地方人士的幫忙。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石啟貴。石啟貴生於1896，湘西乾城人。他的幼年及青年正值清末民初大變革的時代；不只是政治革命結束傳統中原帝國，在社會、科技、思想各方面都有知識分子呼籲求新、求變。石啟貴小時曾入私塾，後來便由新制小學讀到大學。當時在民族主義追求“團結”與“進步”的二元精神下，他一方面有思在教育、經濟方面臻苗族於進步民族之列，一方面又以發掘、發揚本民族文化來凝聚、強化苗族認同。大學畢業後，他變賣家產到各大城市遊歷了半年，購了些織襪機、紡紗機、照像機及新品種的水稻種子等等返回故鄉，投身於多項新事業中。由經濟、教育來促進苗鄉的進步是其主要志業。他在乾城積極投入教育工作，在鄉間進行改革農業生產工作，並組織乾城苗民文化經濟改進委員會。由這一段經歷可見，石啟貴生長於近代中國發生變革的大時代，他自身也因勢投入此建造新中國的大業，並由本鄉本土的改造、改進做起。

1933年凌純聲與芮逸夫等人到湘西作苗族調查，石啟貴成為他們最得力的協助者。如前所言，當時許多本地士紳並不樂見外來學者在此採集苗俗。石啟貴卻得風氣之先，為凌、芮提供許多的地方民俗資料。特別是，苗族歌謠、巫辭、傳說皆世代口傳，不著文字。在凌、芮兩人的要求下，石啟貴以漢字記苗音之法，將許多本土生活習慣、宗教儀式、婚喪禮俗、民間傳說等等口傳記憶與知識化為文字記載¹³。凌純聲與芮逸夫離開湘西後，他們請石啟貴繼續為史語所採訪苗族民俗文化，並由中央研究

11 凌純聲、芮逸夫，《湘西苗族調查報告》（上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47），頁202。

12 王建民，《中國民族學史》（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7-98）上卷，頁180。

13 凌、芮在調查歸來後，將這些資料交史語所收藏；此便為該所所藏《湘苗文書》的由來。

院正式任命石先生為補充調查員。此後三年，石啟貴踏遍乾城、永綏、鳳凰等地苗鄉，調查苗族風土物產、生活習俗、民間宗教。

1940年凌純聲與芮逸夫寫成《湘西苗族調查報告》¹⁴，因時局變遷而延至1947年出版。這本報告始於一篇序言，而後分章節敘述苗族名稱的歷史變遷、苗族地理分佈與湘西苗疆之地理、經濟生產、飲食服飾、家庭與婚喪習俗、政治組織、巫術宗教、神話傳說，等等。這樣的章節主題安排，一方面反映的是人類學“民族誌”書寫傳入中國後，造成的對“他者”之關注、觀察與描述。這些關注、觀察與描述有特定主題，相對於黎光明等人之隨興觀察、描述。在觀察、描述中研究者對邊疆人群的主觀見解儘量被隱藏，並代之以“民族”觀點，相對於黎光明等人處處表現其對“無知邊人”的嘲弄。然而這樣有學科（人類學）規範的、“客觀的”觀察與描述，也建構了“苗族”這樣的邊疆少數民族概念。雖然凌與芮所見的苗族文化多受漢化影響，但他們儘量在最偏遠鄉間（以及在舊方志中）發掘其不同於“漢人”的文化成分，並特別強調其婚喪習俗、宗教巫術與神話傳說。如此強化了苗族有別於漢及其它民族的少數民族“本質”，同時也強化了其落後民族之意象。另一方面，這本著作首章有關苗族名稱歷史變遷的論述，將“苗”之族源推及於周代中原之“髦”，並建立一個“髦”族由中原向西南大遷徙的歷史；如此，歷史將苗族與中原民族緊密的聯結在一起。以歷史建構“我們”，以人類學建構“他者”，這是近代世界學術與文化認同下的普遍現象。

另外，1940石啟貴完成《湘西土著民族考察報告書》初稿；此稿也就是1986年出版之《湘西苗族實地調查報告》之底稿。比較《湘西苗族調查報告》與《湘西苗族實地調查報告》的內容、章節與書寫體例，可以發現兩者皆由其作者或作者們獨立完成。

雲南民族考察與民族之辯，1934-1939

1934，歷史語言研究所聘英國倫敦大學生物統計學與人類學博士吳定良，以及留學德國漢堡大學專長於體質人類學的陶雲逵，加上凌純聲、芮逸夫等人，由此形成史語所之人類學組——這是當時國內陣容最強大的民族調查、研究團體。史語所還為了民族調查進口許多先進科學儀器，包括各種測量身高、頭顱、髮色的測量儀，與高度計、相機、攝影機等等¹⁵。

1934年史語所與雲南省政府合作，進行雲南省內的民族調查。凌純聲率技術員勇士衡為一路，往大理、保山、河口、蒙自、騰衝一帶考查邊民之生活習俗與社會；陶雲逵率趙志誠等人為一路，往麗江、中甸、維西等地，考查重點在民族體質、語言。次年，芮逸夫也加入此考察團之行列。他們的工作一直進行到1937年。其間，由於史語所人類學組之學者們熟悉西南邊疆人事，因此受國民政府外交部之邀，參與中英滇

14 凌純聲、芮逸夫，《湘西苗族調查報告》（1947；台北：歷史語言研究所，1993）。

15 歷史語言研究所仍保有許多七、八十年前購自國外的先進科學儀器，如各種測量人體、骨骼、髮色的儀器工具，萊卡相機、攝像機及柯達底片。

緬南段界務會勘工作。1935年11月至1936年4月，芮逸夫、凌純聲等與中英雙方代表，在軍隊護衛下一同至滇緬邊境之孟定、耿馬、猛董、班洪、班老、南大、瀾滄、西盟等地。他們深入佤族土司所轄的各山區村寨，造訪當地土司、頭人。因需隨勘界委員行動，他們只能沿途短暫訪問多個族群——以當時使用的族稱來說，包括擺夷（傣）、裸黑（拉祜）、栗僛、阿佤（哈尼）、山頭（景頗）、崩龍（德昂）、佤（佤）等族群村寨。

前一段在滇的民族考察工作，反映的是在長期歷史發展與本地人類生態情境下，雲南成為國家與國族內其“民族”最待釐清的色板——不僅各地族群文化多元，且由於漢化之效，在許多地方漢與非漢民族間的界線也很模糊。也反映著當時語言學、體質學與民族學，被用來作為識別、區劃民族界線的三大利器。後一段參與勘界的工作，反映國族主義的時代也是一個全球資源競爭的時代；在國族概念下已無模糊的邊疆，而代之以明確的國家與民族邊界。譬如，與英國共同勘定中緬邊界，以及相當程度導致此勘界的1934年班洪佤族抗英事件（由於英國進入佤族地區開礦），都反映著歐洲帝國主義在國族主義下的全球資源掠奪，以及因此造成中國國族主義的激昂與相對的邊緣爭奪。

1937-39年，為了逃避戰爭，歷史語言研究所遷於西南，傅斯年等史語所學者因此寓居昆明。這時，顧頡剛在昆明為《益世報》主編《邊疆周刊》。此刊物之發刊詞宣稱：

要使一般人對於自己的邊疆得到些認識，要使學者們時時刻刻不忘我們的民族史和疆域史，要使企業家肯向邊疆的生產事業投資，要使有志的青年敢到邊疆去作冒險的考查，要把邊疆的情勢儘量貢獻給政府而請政府確立邊疆政策，更要促進邊疆人民與內地同胞合作開發的運動，並共同抵禦野心國家的侵略¹⁶。

這些話語都顯示在那年代一般人對邊疆的認識缺乏，顯示國族疆域及其邊界如何透過“歷史”得到肯定，顯示對外來者爭奪邊疆的憂慮，以及期望以積極開發讓邊疆得以脫離落後。

就在此時，《邊疆周刊》上掀起了一陣“民族”的討論熱潮。起因應是，在日本侵華及英法等國覬覦中國西南邊疆的情勢下，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非常關懷一些學者在雲南進行的邊疆“民族”研究。他在給顧頡剛的一封信中稱：「夫邊人自昔為賤稱，邊地自古為不開化之異名，此等感覺雲南人非未有也，特雲南人不若川粵人之易於發作耳。¹⁷」顧頡剛也為文應和他的意見；稱“中華民族是一個”，無必要在內部再分什麼“民族”。顧的文章得到許多的回應；大部分為文者都同意他的意見，或以歷史指證中華民族原為一體，或指在國難之前國人應團結勿以一個個“民族”來造成內部分化。惟少數學者如費孝通，以人類學的民族概念（語言、體質、文化）指出中國之內原來便由多民族構成，無需誨言，達成內部各民族平等才是維繫國家團結切

16 《益世報》邊疆周刊發刊詞，1938年12月19日；引自周文玖、張錦鵬，《關於“中華民族是一個”學術論辯的考察》，《民族研究》2007年第三期，頁21。

17 相關資料見，傅樂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傳記文學》1963年2卷5期。

要之事。

傅斯年在另一封給朱家驊、杭立武的信中¹⁸，稱：「此地漢人其祖先為純粹漢人者本居少數，今日漢族在此地之能有多數，乃同化之故。此一力量，即漢族之最偉大處所在……。概此等同化之人，本諱言其淵源，今言之不已，輕則使人生氣，重則使之有分離漢人之意識，此何為者哉！」他又寫道：「此地正在同化中，來了此輩“學者”，不特以此等議論對同化加以打擊，而且專刺激國族分化之意識…。夫學問不應受政治之支配，固然矣。若以一種無聊之學問，其想影響及於政治，自當在取締之列。」他所稱的學者，指的是費孝通及其師吳文藻。當時吳文藻為雲南大學教授，其薪來自于中英庚子賠款董事會。朱家驊、杭立武分別為該董事會之董事長及總幹事。因此傅斯年寫此信之動機不言可喻；便如傅樂成（傅斯年之子）所言，是欲將吳文藻調離雲南大學，以阻礙其弟子費孝通等的邊疆民族研究。

然而傅斯年並未阻礙史語所人類學者們的邊疆考查；在此之前及之後，史語所對其人類學組的邊疆考查都給予十分的支持。

芮逸夫的川南敘永苗族考察，1942-1943

因中日戰火逼近，1940年秋史語所遷於川南李庄。由此至1945返回南京，這中間史語所學者們的民族調查工作並未中斷。1939至1940年間，芮逸夫到貴州大定、花溪、青岩、貴陽、貴定、安順、鎮寧等地進行貴州苗族調查。1941年芮逸夫、凌純聲協同中央博物院的馬長壽，至川西馬爾康、汶川、小金、松潘、康定等地作“西番”與羌族考察¹⁹。由1934年與雲南省政府合作的民族考察，到1941年的川康考察，這八年中凌純聲、芮逸夫等人可說只是“走馬看花”式的探訪，並未有深入的民族學、人類學研究。

當史語所在川南李庄住定後，1942年12月至1943年5月，芮逸夫與胡慶鈞到川南的敘永進行苗族考察——這是芮逸夫、凌純聲在1933年的湘西苗族考察之後，史語所學者另一次較具人類學意義的一次田野考察。當時芮逸夫是史語所的副研究員，胡慶鈞則是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的學生，在史語所隨凌純聲等人學習民族學。在這期間，只有剛開始約一個月的初期考察兩人同行，隨後他們便分頭進行田野。這次川南苗族考察所得資料，後來曾編成《川南鴉雀苗的婚喪禮俗·資料之部》一書，在1962年由史語所出版²⁰。此外，芮逸夫尚留予史語所一本考查日誌，內容為日程及其所見所聞之隨手筆記。《川南鴉雀苗的婚喪禮俗·資料之部》一書，與《湘西苗族調查報告》類

18 相關資料見，傅樂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傳記文學》1963年2卷5期。

19 參與這次考察的還有中央博物院的馬長壽先生。後來，只有馬長壽持續專注於康藏地區的研究而頗有著述。

20 芮逸夫、管東貴編，《川南鴉雀苗的婚喪禮俗·資料之部》（臺北：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另外，胡慶鈞先生也曾於1944年在重慶的《中央週刊》、《邊政公論》等刊物上發表有關此行的文章。該等文章經作者修改後曾重新發表；見胡慶鈞，《漢村與苗鄉》（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頁185-254。

似，作者由描述婚喪等禮俗中展現川南苗族的傳統文化，藉此由文化上刻劃川南苗族。

芮逸夫此行留下的考查日誌，為當時邊疆社會情境以及調查者與本地人士的互動留下珍貴的資料。日誌中多處記載，芮與胡在川南敘永一方面從事少數民族之語言、文化、體質考察，一方面經常受邀至地方政府、學校作“中華民族之意義”、“種族平等之意義”這一類主題之演講。他們與訪客、友人的話題，也常離不開中國民族、民族。又有一天早晨，芮逸夫讀了《國民政治教本》之後，又讀Charles Wagley 所著 *Economics of a Guatemalan Village*²¹。這些行動，都顯示在那時代民族學、人類學知識與國族建構並行而不勃。又如，關於本地人的漢化情形，芮在日誌中記載本地的一些漢化習俗，以及人們宣稱祖上來自湖廣或江南。更具意義的是，芮故意用苗語和本地人溝通，但他們皆以漢話回答；芮在日誌中寫道，「蓋此間苗人均以說苗語為恥也。」模仿漢人習俗、說漢話、宣稱祖先來自湖廣，這些傅斯年所見“漢族之最偉大處所在”的同化，其背後的本土情境表現在芮的日誌中——為了避免受他人歧視、欺侮而生的仿他（mimesis）行為。

在這本早期中國人類學者的田野日誌中，我們可以仔細“閱讀”人類學者與本地人之間的互動。如前所言，他們發掘本地非漢習俗固然曾引起一些當地士紳的不悅，但其學術考察行動對於本地更深沉的影響是：他們傳播了一個訊息，本地“土俗”並非是什麼落後而應被革除的鄙陋之俗，而是應被釐清（並與漢文化區分）的本民族文化。對於協助芮逸夫等人作調查的本地人士而言，在提供本地習俗資料予學者的過程中，他們一方面接受新的民族知識而對自己有新認識，同時他們成為本民族文化的採集者與詮釋者，並因此對本土文化產生強烈的自信、自覺，如此更強化其“苗族”認同。

此日誌中提及的一本地青年韓介休，為當地鄉民代表會中唯一苗民代表。1940年他由成都返鄉，1941年籌組“敘蘭邊民文化促進會”，1942年創辦邊民學校8所，至1943已增至12所。他與芮談論苗人在當地之政治地位，苗人知識分子、士紳等之社會地位，以及漢人對苗人的鄙視等等。芮在日誌中記載：「與介休談苗族一切問題，頗有見地。以一耶穌教徒不為耶教所囿，尤為難能可貴。」

結語

歷史語言研究所之民族考察行動與由此產生的著作，只是20世紀許多發生在邊疆的、針對邊疆的社會事件與文本的一部分。這許多的事件與文本，作為社會表徵，皆涓滴的形塑、改變著中國民族國家之“邊疆”，特別是邊疆之人。所謂事件與文本，在此指的不只是史語所學者的調查行動與學術著作，也是或更重要的是，地方人士在與他們的互動中所發的行動、言談與文字著作。

21 參見，芮逸夫，《川南苗族調查日誌1942-43》（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8），1942/12/10及1943/1/26之相關內容。Charles Wagley 所著 *Economics of a Guatemalan Village* 出版於1941年；至少在1942-43年芮已在閱讀此書，可見芮先生非常注意西方人類學的新作。

黎光明與王元輝在1929年的川西之行，代表民族學、人類學——國族邊緣建構最重要的工具——尚未在中國生根時的民族考察。這時的“邊疆”在國人眼中是落伍的、陌生的、混亂的國族邊緣；促使黎光明與王元輝走入邊疆的動機，顯然是民族主義下的政治熱忱大於學術緣由。在與地方人士的互動中，他們嘲笑舊社會的土官與喇嘛，在文字間突顯土官與喇嘛的無知；便在如此行動中，本地原有的知識與威權落入邊緣。或者，如當時的瓦寺土司索季皋，從報章雜誌上吸收國家與國際新知，並向外來訪客誇耀其知識，以獲得其新的知識與政治威權。

凌純聲、芮逸夫1933年的湘西行，其意義是第一代人類學者對“邊疆”的探索。事實上，他們的湘苗研究也參與改造“邊疆”——將長期漢化下模糊的“華夏邊緣”化為國族內的少數民族之區。漢化的當地士紳反對並向國民政府抗議他們的民俗調查，是一個十分有意義的訊息，一種表徵。若我們將此表徵視為“真實”，那麼我們也將如那一時代傅斯年所見：本地人皆已同化，說他們不是漢人還會惹其生氣。然而在更深處，這樣的看法忽略了“邊人”被歧視下的受辱情感，忽略了當地士紳的告狀只是當時社會情境本相（族群歧視）下的一種表相而已。更有意義的是凌芮兩人與苗族知識分子石啟貴之間的互動，以及石啟貴在史語所學者離去後繼續從事的苗族文化蒐集、著述，以及其所從事的政治活動²²。

史語所的成立，史語所學者的民族、民俗調查研究，都是這一中國國族邊緣再造的一部分。然而，完成此國族邊緣再造更重要的一個因素便是“本土的聲音”。近代民族學、人類學之田野調查，可說是一種發掘“本土聲音”的學術活動，然而民族誌書寫仍是一種“他者描述”。在此，我們可以見著石啟貴之作為的時代意義——他不只是民族調查者的助手，而更是本地苗族自我意識的發聲者。他不只提供本土民俗、宗教資料予外來的民族調查者，他也自己寫作《湘西土著民族考察報告書》，藉此以本土的聲音宣告“我們是這樣的苗族”。他對湖南省政府、國民政府的多次建言，他以“湖南土著民族代表”身分出席國民大會，在會上提案呼籲落實民主、民族平等與經濟平衡發展，都是如此的本土發聲。1943年芮逸夫在川南敘永結識的苗族青年韓介休，也是如此的苗族知識分子。

1934到1941年之間，芮逸夫、凌純聲兩人在南方與西南中國邊疆到處奔走，他們調查的族群，以當時所使用的族群名稱來說包括畬人、民家、擺夷、麼些、猓黑、卡瓦、阿瓦、佯喇、戶漢、古宗、樸喇、儂人等30餘種。然而除了所攝照片以及蒐集的少數民族文書、文物外，他們並未留下任何可歸類於“人類學民族誌書寫”的田野日記、雜記、報告；這段時間，他們所從事的究竟是什麼樣的民族學工作？後來在1941至1946年間，芮逸夫發表了一系列有關西南民族與中國國族的文章——《西南少數民族蟲獸偏旁命名考略》、《中華國族解》、《西南民族的語言問題》、《中華國族的支派及其分佈》、《再論中華國族的支派及其分佈》。這些著作，乍看來雖與“人類學”或“民

22 1936年，石啟貴任湖南省政府參議，與龍輯五等人代表湘西苗民共同提出《湘西苗民文化經濟建設方案》。此後為了苗族的經濟發展與社會地位，他多次以地方賢達、民意代表身分向湖南省府與國民政府建言。

族學”無關，但卻表現他多年來從事民族調查與研究的一種最終關懷——建構中華國族之內涵，並刻劃其邊緣。由此我們可以理解他與凌純聲等人，1934到1941年間在雲南、四川所從事的民族考察之意義：舊帝國時期西南之非漢族群是被轄控於帝國邊疆的“異族”，而經近代“國族邊緣再造”後成為中國國族內的民族成員。凌與芮等人的工作與論述，後來成為“科學化”中國民族分類、識別的先聲。

另外，1940年史語所人類學組學者曾受國民政府行政院之委托，訂定《改正西南少數民族命名表》，由當時國民政府行政院頒布施行。這是透過學術研究、考訂，將所有歷史上對西南各非漢族群帶有污辱性的稱謂改正過來；如將猺、獞、猓等帶“犬”字邊的族名，更正為帶“人”字偏旁的僮、僮與僮。雖然此與1950-1960年代中國所識別、命名的少數民族族稱有些差別，但我們從華夏邊緣的長程歷史變化看來，這的確有劃時代的象徵意義——過去在舊帝國之下受歧視的、被視為非人的邊緣“蠻夷”，被轉化為國族內具有國民人格之“少數民族”。

最後，我要再提及黎光明，那位最早從事邊疆民族考察，其成果在學術上被認為是無價值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員。1929年到川西考察民俗後，不久他便離開史語所，投身於教育與軍政事業中。1946，當年與他同往川西考察的王元輝受國民政府之命擔任16區專員，負責整頓川康地區軍政、民政。黎光明也因此擔任靖化（今四川甘孜州的金川縣）縣長，兩人在此的主要任務是掃煙除惡。黎光明任縣長未久，便設宴伏殺當地掌控鴉片買賣的袍哥頭子杜某。以當時之邊區局勢來說，黎此舉幾乎是有意以身殉道。果然，當日袍哥黨羽便攻入縣府，黎遭殺害，並受曝屍之辱。黎光明與王元輝在1920年代的川西民俗考察之行，1940年代他們在同一地區的軍政活動，可以說與凌純聲、芮逸夫等人的邊疆學術事業一樣，都是近代中國國族邊緣再造的一部分。這個例子也說明，中國國族邊緣再造不只是透過政治與學術將過去的“蠻夷”變為“少數民族”，也是將各方力量難及的、混亂的“邊疆”納入在整體國家政治秩序之內。黎光明最後為此貢獻出他的生命。